



宋代隐逸文人 群体研究

SONGDAIYINYIWENREN
QUNTIYANJIU

► 王小兰◎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隐逸文人 群体研究

SONGDAIYINYIWENREN
QUNTIYANJIU

► 王小兰◎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隐逸文人群体研究/王小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383-5

I. ①宋… II. ①王… III. ①隐士—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K244.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6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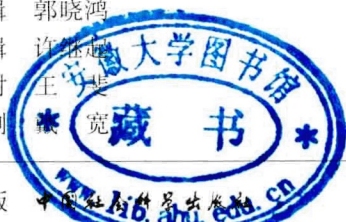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许继超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有关隐士、隐风及隐逸文学的讨论，向来是两宋文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已经面世的相关成果，其考察范围大多局限于北宋阶段，而陈抟、种放、林逋及潘阆等四大名隐又最为议论重点。相对而言，南宋隐逸群体则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学识渊厚、隐德纯粹、诗艺超群的避世隐君，迄今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究其原因，隐逸人群大多不求闻达，其生平事迹难以详察，诗文作品亦散佚殆尽，由此造成的研究困难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文史学家有关两宋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成就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主导社会发展的时代精英阶层，而该阶层中成就显著者几乎全是仕宦文人。至于超然世外的隐逸人群，则视其为“非主流”而常被付之阙如。虽说这样的认识和做法有待商榷，然而改变积久而成的学术观念，实非易事。

其实，关于隐、仕两种人生境界的高下异同，在古代典籍中早已得到了确认。其如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八《隐逸传序》所云：“所贵乎天下之贤者，出与处而已。朝廷之士以进为荣，山林之士以退为高。《易》曰‘遁世无闷’，又曰‘不事王侯’，此山林之士所以为高者。与若乃应蒲车之招，被旌帛之贲，则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一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过，隐逸文化的内涵并不固定，其因时因人而异的特点相当明显。譬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①像这样至死无悔的遁世之举虽有其值得称道的精神内涵，但在仕、隐人格的交流，以及时代所赋予的人格新变等方面，

^① 《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23页。

实际缺乏示范可能。而东汉梁鸿、孟光夫妇“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后之齐、鲁，复游于吴地，“潜闭著书十余篇”。^①较之首阳“义隐”二君，他们的“退隐”方式则显然要轻松许多。所谓时易事异，隐逸人格内涵在传承中有着渐变，而这种变化以宋代最为显著。

在研究过程中，两宋出世人群生存方式的阶段性转变，以及隐逸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首先值得重视。有学者认为，赵宋三百余年是我国“近世”历史的开端；撇开其隐含的某些政治理念，单就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而言，这种判断依然值得瞩目。不过，正如历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宋代社会的渐变与转型也是分阶段进行的，而“隐逸”人群生存方式和心态人格的变化也基本与之同步。简而言之，宋初三朝，以“四大名隐”为代表的遁世人群，还基本保持着五代以来栖隐岩穴、“不与俗接”^②的传统做派。他们倾心满足于“浊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③的旷达和超逸，深受朝野敬重。不过，大约从仁宗时代起，邵雍、高悸、徐复、孔旻、周启明等新一代的隐逸人群，其遁隐的方式已发生了较大转变。他们与世俗人生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步缩小。北宋中期，尤其是自神宗熙宁以后，随着朋党斗争的不断恶化，许多文人雅士次第逃离官场，过起了放浪形骸、超逸洒脱的隐居生活；他们弃世归隐的理由各不相同，退归之后的生活态度亦各自有别，但都为丰富隐逸群体的生存方式、强化隐逸文化的时代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宋室南渡之后，与“和、战之争”相关联的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众多文学之士既不满朝廷“和议”，又见秦桧等奸佞权臣专横跋扈，便索性放弃科举，远离仕途，纵情于名山胜水之间。还有一些宦途游子，因不满时政或饱尝仕途沉浮之苦，最终决定挂冠归隐，加入了隐逸者的行列。尤其是自“开禧北伐”失败以后，这种情形更是愈演愈烈，难以遏制。大抵从那时起，一直到宋、元政权更迭前后，日益浓重的末世情绪四处蔓延，越来越多的饱学之士

① 《高士传》卷下《梁鸿传》，《四部备要》第4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上。

② 《江南野史》卷八《陈陶传》，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2页。

③ 陈抟：《谢表》，《全宋文》第1册，第224页。

只能隐藏形迹，或寂寞于乡野，或奔波于江湖。该时期隐逸人群身份、个性之多元，德操品行、知识结构及文学修养之复杂，均超过了已往任何时期。

准确把握隐逸阶层的人格特点，深入分析其有别于已往的心灵发展轨迹，乃是宋代文化及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严复所谓“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①者，不仅是指那些饱经宦海沉浮之苦的士大夫群体，也包括那些与“人心政俗”相始终的方外隐君。两宋时代，隐、仕人群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人格互补的层次与内涵也远远超过了隋唐五代。像邵雍、赵十朋、汪晫、汪莘、刘学箕、陆凝之、蔡元定、陆九韶、薛师石、吴锡畴那样的高隐名士，已很难与“不与俗接”的五代隐君相提而并论。譬如，邵雍既能高隐百源，从容优游于山水之间，仔细体会往日圣贤所揭示的精义妙道；同时也能与司马光、富弼等宦途名公亲切往来，并敏感认识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极矣。前或未至，后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②的时代盛况。他以布衣“俯仰天地间”，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他虽然隐居洛郊三十年，但并没有将自己埋没于山野岩穴；其“为人坦夷，无表襮防畛，不为绝俗之行”，^③成为两宋高隐之典范。在党祸频仍、宦途多舛的北宋中期，康节公以其悠游自得、平和宽厚的心态立身处世，名倾天下而又逍遥自在，程颐所谓“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④即此谓也。

对文学史研究者而言，以隐逸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为前提，进而分析其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等方面的时代特点，考察其诗文歌词创作因时而异的特点与成就，无疑是必要的。虽说这方面所涉及的问题纷繁而复杂，但追本溯源的研究思路值得坚持。譬如，缪钺尝谓“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⑤梅，无疑是宋诗品格的象征，而以梅“别立品题”源自宋初隐士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林逋将雅逸清超、平淡内敛的出世情怀熔铸在咏梅诗作中，既构成了

① 《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②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5页。

③ 范祖禹：《邵康节先生雍传》，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54册，第66页上。

④ 朱熹编：《二程外书》卷一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108页下。

⑤ 缪钺：《宋词散论·论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疏淡、清雅、幽峭的高妙诗境，又昭示着超逸脱俗的高尚人格；所谓“清风千载梅花共，说着梅花便说君”^①的双重价值，即在于此。林逋之后，两宋隐逸作家一直对梅花情有独钟。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个体境遇也不尽相同，故对梅花气韵精神的感悟也往往有所差异。如“江西诗派”之隐逸作家，其咏梅作品中隐含的仪态和情致往往是冷峻、孤寂而又满怀忧患，这与他们狷介脱俗、抱道自守的人格特点完全一致。南宋时期咏梅已“为诗家一大公案”，^②从江湖隐君“为忆城南清瘦友，寒宵梦里见梅花”（薛师石《怀紫芝》）的寒寒和清癯，到宋末隐者“颇觉凄凉无晤语，临风说与冻梅知”（吴锡畴《楚东岁暮》）的绝望与凄凉，以及亡宋遗民“老梅百窠霸骚坛，峥嵘铁骨傲岁寒”（赵必豫《南山赏梅分韵得观字》）的气节和傲骨，不同的梅花形象连缀成篇，即反映出两宋隐逸人格发展演变的内在轨迹。

当然，看似相近的创作风格，因创作者隐逸心态的不同，也蕴藏着不同的精神内涵。譬如，宋初隐君及“江湖诗派”中的隐逸诗人都追尊“晚唐”，然宋初隐君对“晚唐”诗的艺术传承，主要表现在字句锻炼和追求清幽诗境上，所谓“诗如东野不言寒”^③者为数颇多。而“江湖诗派”之隐君，诗学“晚唐”，实难摆脱衰乱末世的精神制约，所谓“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④者，其深层原因盖在于此。

本书对两宋隐逸群体及文学创作的研究，重点还有以下数端：

其一，检讨史籍，搜寻普查，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两宋隐君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及其学术和艺术成就等。当然，在具体论证过程中，衡量“隐士”的尺度力求做到宽严有度。隐逸，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命题，诸多原始解说均将“隐”与“仕”视为一种相对应的人生选择，其内涵比较宽泛。我们的讨论也以此为前提。广义的隐逸概念有利于从容和全面地把握隐逸人格演变的轨迹及其时代特征。然而，在具体分析隐逸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对隐士的身份则力求进行更为谨慎和严格的鉴别。

① 吴锡畴：《题林和靖墓》，《全宋诗》第64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400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郭豫亨〈梅花字字香〉》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8页中。

③ 苏轼：《书林逋诗后》，《苏轼诗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3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航漫游稿》提要，第1410页中。

其二，审慎考订，明辨真伪，以最大努力确保征引史料的可靠性。由于隐逸人群具有远离时代政治的独特属性，除小部分足够知名、颇具影响者外，普通隐君被正史记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们的爬梳便不得不涉及野史杂记、诗话词话，尤其是地方史志。这些史料虽然珍贵，但假托甚至伪造的叙述也有不少。譬如《陕西通志》卷六四载：“王子华，同州人，博学能文，尤工诗。景德中，与华山隐者齐人翟士端、兖人郑隐、南燕人郑遨、临江罗隐之等号‘五高士’，为一时名流所推重。”考《旧五代史》卷七八《晋高祖本纪》，天福四年（939）十一月载：“丙申，谏议大夫致仕逍遥先生郑云叟卒。”享年七十四岁。据此，郑遨“景德中”高隐华山的说法显然属于无稽之谈。方志编纂者为了彰显地方人物，往往牵强附会，多方拽扯；研究者倘稍疏甄别，便极易造成失误。

其三，分类梳理，系统考察，全面叙述隐逸作家的诗文创作成绩，客观分析其在两宋文学发展史中发挥的作用。在具体讨论过程中，我们以时间先后为序，其用意不仅是为了探讨特定时段隐逸者所以依赖的隐逸生态，其特有的隐逸心态，以及由此决定的创作状态和创作风格；另外一层用意，是想通过对相应的文献的梳理，考察各个时期作家创作和作品存佚的概貌，以期呈现较为清晰的历史线索。

本人于该课题研究确已尽心竭力，然自知学有未逮，疏漏谬悖之处难以避免，诚祈方家宽仁赐正！

王小兰

癸巳初春谨述于杭师大

目 录

引言	(1)
----------	-----

上编 两宋隐逸群体的人格转型

第一章 唐宋隐逸文化之转型	(3)
第一节 从“处幽居蔽”到“终南快捷方式”:唐代隐逸的 几种境界	(3)
第二节 “天地闭,贤人隐”:晚唐五代隐逸人格的蜕变	(12)
第三节 “高士清风”倾天下:宋代隐君的多元风采	(37)
第二章 两宋隐逸文化新内涵的成熟	(57)
第一节 “矫俗扶世”:超越传统的必由之路	(58)
第二节 “当世之务”:难以回避的心灵观照	(77)
第三章 隐、仕人格的分离与契合	(87)
第一节 出世人格独立价值的确认	(87)
第二节 隐、仕人格的互补与契合	(106)

下编 两宋隐逸群体的文学创作

第四章 宋初隐逸群体的文学成就	(133)
第一节 宋初隐逸诗人的创作追求	(133)
第二节 雅逸清超充满个性的多元风格	(146)
第三节 宋初隐逸诗人对宋诗发展的贡献	(158)

第五章 邵雍及其“邵康节体”诗	(167)
第一节 深邃闲淡的人格内涵与诗学理念	(168)
第二节 “邵康节体”诗的艺术特点	(185)
第六章 北宋中后期隐逸文学之转型	(199)
第一节 隐逸文学创作的世俗化倾向	(199)
第二节 政治风云变幻与隐逸文学发展	(214)
第三节 《江西宗派图》中的隐逸作家及其诗作	(232)
第七章 “中兴”时期隐逸文学的时代特征	(247)
第一节 宋室南渡后的隐逸诗词创作	(247)
第二节 理学隐君的山水之思	(272)
第八章 南宋后期的隐逸文学	(283)
第一节 江湖诗派中的隐士及其诗歌创作	(283)
第二节 宋末元初隐逸文学的新特点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14)

上 编

两宋隐逸群体的人格转型

第一章 唐宋隐逸文化之转型

两宋“隐逸”文化内涵与特点的形成，虽然是当日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学术文化氛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它同时也与隋唐五代隐逸文化的传承递变密切相关。假使不能对唐、宋两代隐逸群体稍加分析和比较，则有关宋代隐君有别于已往的生存状态、人格追求及文化贡献等就无从谈起。当然，所谓比较，并不仅仅是简单把握彼此之间的异同，而是要尽可能地勾画出唐、宋隐逸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内在轨迹。要满足这样一种基本的研究思路，我们的考察便只能以“过程”为主。

第一节 从“处幽居蔽”到“终南快捷方式”： 唐代隐逸的几种境界

要想了解两宋隐逸人群与已往不同的情感特点与人格追求，就必须与前代隐君进行比较；只有充分明确了源流正变的历史轨迹，才能厘清其差异所在。

说到“隐逸”，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便是那种“闲云野鹤”、“不与俗接”^①的生活态度。为了凸显那些遁迹出世者非同寻常的生存状态，有人甚至还杜撰出了“吸风饮露，不食五谷”^②之类的奇异传说。其实隐逸者也是一群真实而普通的士人，他们之所以选择遁迹出世，有些是因为厌烦了世俗纷扰，有些则是为了追寻心中的“道”。其如刘宋史家范晔所云：“《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

① 《江南野史》卷八《陈陶传》，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2页。

② 王绩：《东皋子集》下《醉乡记》，《全唐文》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5页。

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田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①

不过，当人们走近隐逸人群，并逐步了解到他们心中真实的渴望时，就会发现“道”而隐者其实并不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遁迹出世者的心理期待和人格追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谓“仕”、“隐”之间的距离有时较为接近，有时则相当疏远；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固然很多，但首当其冲的乃是隐逸群体生存状态的恶化或改善。从李唐至五代十国再到宋初，情形便是如此。

唐之盛时隐风亦盛，在那个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时代，广大士人对隐、仕人生的选择也相对自由，出处之间似乎并没有那种森严壁垒的隔阂。从诗文作品及野史杂记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当时比较著名的隐士遍布海内，难以胜数，而隐逸群体与仕宦文人之间的交往和酬答更是非常普遍。然《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所载录的隐逸者，却只有王绩、田游岩、史德义、王友贞、卢鸿一、王希夷、卫大经、李元恺、王守慎、徐仁纪、孙处玄、白履忠、王远知、潘师正、刘道合、司马承祯、吴筠、孔述睿（子敏行）、阳城、崔颢等二十一人，再加上《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中增补的朱桃椎、孙思邈、孟诜、武攸绪、贺知章、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等九人，总数也不过三十人而已。很显然，这个数字与唐代隐逸人群的实际规模相去甚远。除此之外，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别有载录，颇可补两《唐书》之阙，如张彪、刘方平、张众甫、赵微明、卢仝、朱放、方干、陆龟蒙、周朴、唐求等等。不管怎样，作为唐代隐君的典型代表，这些久负盛名的人物，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隐逸人格的发展情状。

同样是避世野处、以远离宦途而获誉者，其对待隐逸的态度却各有不同：有甘心林泉、略无俗态的“真隐”高人；也有“身在江湖”而“心游魏阙”的计谋之士；还有一些是徘徊于仕、隐之间，出处无定的宦途游子。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而我们的分析也只能

^①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55页。

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逐次进行。

一 真隐：传统隐逸方式的延续

也许是由于六朝隐风的惯性传承，隋及唐初尚有一些纯粹的隐士，他们真心出世，以“养性”、“修德”为终极追求。如龙门王绩，王文中子通之弟也，少“与李播、吕才善。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瘖，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鳧雁，蒔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佗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度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尝“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①稍晚一些，有卢鸿者，“字浩然，隐居崧山。博学，善八分书。工诗，兼画山水树石。开元初，玄宗备礼征再三，不至。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有年。虽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鸿遂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诏许还山。将行，赐隐服役，官营草堂。鸿到山中，广精舍，从学者五百人”；“后皮日休为《七爱诗》，谓‘傲大君者必有真隐，卢真君是也’”。^②

此外，《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所载之李元恺，也与上述二人相仿。其文称元恺“博学，善天文律历，然性恭慎，口未尝言人之过。乡人宋璟年少时师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遗元恺束帛，将荐举之，皆拒而不答。景龙中，元行冲为洺州刺史，邀元恺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元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但恐不能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涂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乃以己之所蚕素丝五两以酬行冲，曰：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六《王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5页。

^②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4—178页。

‘义不受无妄之财。’先是，定州人崔元鉴明《三礼》，乡人张易之宠幸用事，荐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乡请半禄，元恺诮之曰：‘无功受禄，灾也。’元恺年八十余寿终。”类似的隐士还有田游岩、王友贞、卫大经、朱桃椎、孙思邈等，不烦赘述。

就整体而言，有唐一代，像王绩、卢鸿这样隐德纯粹的世外贤人并不是很多，他们身上所呈现的那种毅然决然的出世态度，应该说仍然属于汉魏六朝之遗风。

随着大唐帝国的不断开放与空前繁荣，类似的隐逸者必然会逐步减少，此乃大势所趋，难以逆转。

二 “计隐”：以隐求仕的终南快捷方式

就史籍所记载的情况看，隋唐以后，像严光、“四皓”那样绝世出尘、超然物外的隐逸者似乎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的唐代隐君都是把隐迹不仕当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所谓“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①者，比比是也。为了和“真隐”高士相区别，我们姑且称此种情形为“计隐”。譬如，《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二月癸卯载：“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快捷方式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这则故事被后世学者反复征引，以说明唐人在待隐问题上的普遍态度；所谓“终南快捷方式”，便成了唐代隐逸者以“隐”求“仕”的代名词。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同样是利用隐、仕之别以谋取成功者，其做法还有些许差异，不可混为一谈。

其一是由隐而仕，终得美宦者。如苏州昆山人史德义，咸亨初（671）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劳使、文昌左丞周兴表荐之，则天征赴都”，“授朝散大夫。后周兴伏诛，德义坐为所荐免官，以朝散大夫放归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5页。

丘壑，自此声誉稍减于隐居之前”。^① 不管怎样，在由隐而仕的道路上，史德义的努力总还是成功的。要知道，唐代有不少人都非常希望能够凭借其高隐之名而受到朝廷“征召”，继而飞黄腾达，但这样的梦想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实现。譬如，被文学史家列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旗手之一的孟浩然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渴望。《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本传谓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则云：“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恍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此虽小说家言，未足凭信，然孟浩然怀抱出仕渴望，终无所成，却是事实。平心而论，李唐王朝有着非常严格的科举制度，其各种人才的选拔途径基本上还是畅通的；朝廷对于著名隐君的征召都是以“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为目的，其受赐机会本来就不会太多。^②

其二是先仕后隐，最终名列隐逸者。如《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所录之汝州孟洗。此公少“擢进士第，累迁凤阁舍人。他日至刘祎之家，见赐金曰：‘此药金也，烧之，火有五色气。’试之，验。武后闻，不悦，出为台州司马，频迁春官侍郎。相王召为侍读。拜同州刺史。神龙初，致仕，居伊阳山，治方药。睿宗召，将用之，以老固辞，赐物百段，诏河南春秋给羊酒糜粥。尹毕构以洗有古人风，名所居为子平里。开元初，卒，年九十三。洗居官颇刻敛，然以治称。其闲居尝语人曰：‘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当时传其当”。像这样久历宦途后致仕归山的“隐士”，实际算不上真隐，但史官既将其归入《隐逸传》中，可知他们对此种“隐逸”类型也是相当认可。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虽说其归隐之由各不相同，但“功成身退”的表现却基本一致。如“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为监察御史。时罗织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张知默推诏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二《史德义传》，第5117—5118页。

② 《论语注疏》卷二〇，清阮元较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35页。